

舒新城著

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發行

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全一冊）



實價國幣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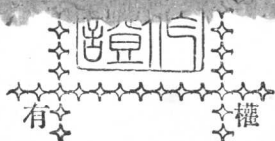
著者 舒新城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所
海 澳門 路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 總 行 處
行 處
各 埠
中華書局



敘

我生於窮鄉僻壤的農村社會，幼時所受的私塾與書院的教養，除我生活上以很大的影響；所以十五歲以後，雖然受過十年的新教育，二十五歲以後，作過十年的教師，但對於新教育制度，總是懷疑。

我懷疑中國何以要改爲工業革命後的新教育制度，我懷疑這種教育制度對於中國社會的適應性。十五年前，我曾爲此疑問題讀過一些書，請教過一些人，但不曾得着明確的答復。民國十年而後，因爲經驗的驅策，很想從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個適當的解答，於是着手於搜集史料；十四年以後，更專心於全般近代中國史之研究，以期治近代中國教育史有較深之根基。自十四年至十七年之三四年間，除將平日搜集之教育史料擇其最重要者整理爲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冊外，更不時在各雜誌發表有關近代中國教育史之論文。初意本擬先就研究所得，分別理爲初稿，就正有道，以期陸續修改，逐漸擴充爲初等、中等、高等、師範等教育專史，再就各專史而別輯百萬言之近代中國教育通史。乃至十六年

主持辭海編輯事務，即不能專力於此，祇以餘暇整理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國留學史兩冊。十九年主持中華書局編輯以後，忙於事務，更無力及此。雖其間曾發憤多次，將目次擬定，材料集好，以期伏案執筆，由專史而通史，但終為時間所限制，不能完成。——十九年以後，雖亦間有所作，但均係時作時輟之短篇，不能成冊。——至二十三年，因恐材料遺失，乃將其一併移售於公司，同時並擬將十餘年來之治學計劃放棄。

可是生活每為習慣所支配：舊日收集之材料雖經售於公司，但取用仍甚自由，且甚便利，於是又不斷地搜集新材料，而舊計劃也更不願放棄了。不過事實上也無法有長久的歲月，從事著作。祇於無可如何之中翻閱舊日已發表之論文，冀能略加補充，或將應有之部門完成，（有幼稚教育小史、留學教育小史而無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教育行政等小史。）或將最近之變遷加入，但結果又成泡影。

由這泡影，更引起一種戀舊之感：就是怕這些不入時而不完備的論文，現在若不搜集，再過若干時便會散失無存。於是又將十年來所發表之有關近代中國教育史的論文而現在尚可敝帚自珍者選成一冊，名曰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

全冊計正文七篇，均直接與近代中國教育史有關之論文；附錄二篇（最末一篇爲朱智賢君所紀錄）則大半述及個人教育意見之所由來。似亦爲朋友所願看。各文寫就之時間，前後將及十年，其間自有不運貫與重複之憂，不過觀點似尚不相矛盾。我現在雖無暇執筆，但對於舊有計劃，仍不願放棄，對於現教育之觀察，似亦較前清晰，對於治學之方法，似亦較前稍有進步。好在歷史是無窮的，倘使我能繼續努力，再遲二十或三十年完成近代中國教育通史，亦不爲晚；若有人負此重擔能早日完成此大業，則更爲我所馨香頂祝！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上海

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目錄

近代中國教育史問題·····	一
中華民國教育小史·····	三五
近代中國幼稚教育小史·····	六三
近代中國中學教育小史·····	七九
近代中國師範教育小史·····	九三
近代中國留學小史·····	一二九
最近中國教育思想的轉變·····	一七五
附錄	
中國教育之出路·····	二〇九
我和教育·····	二二五

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

近代中國教育史問題

(一) 本問題之範圍

梁啓超說：「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活動廢續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頁一）分析言之：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廢續活動的科學，其功用在明因果與資借鑑。本此原則，則專述近代中國人之教育活動，求出其因果關係以供現代及後代教育上之資鑑者爲近代中國教育史。

此定義中，我們應先討論兩問題，即（一）何謂教育？（二）何謂近代？

教育原是改進人類生活的有意活動。從廣義講，人類活動之有影響於生活之改進者均可稱爲教育。不過這樣廣義的教育問題，不是我們所能討論：因爲果如此，則宇宙中一切活動對於生活均直接間接有影響，均可列入教育範圍之內，既非我們力所能任，而且侵佔「通史」的領域。我們所能討論之教育問題，只限

於常識中之教育含義，亦即特別注重於「有意」及「改進」數字。如此則個人的生活史，宇宙的自然史，我們雖然也爲看牠們對於「教育」上之影響而研究及之，但決不以之爲教育史上之正宗。換言之：我們所欲研究之教育問題，只以有組織有系統之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思想等爲限，其他如政治、社會、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只探究其與教育有關之事實以爲建立教育史之旁證。

至於「近代」兩字的含義，不獨歷史家異說紛紜，即各種專史之分期亦不能一致。我們所欲研究者爲中國教育史，故應從中國教育事實之本身上立標準，不必顧慮他人之異說。在中國教育之事實上有一種最顯著之現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後之工商業社會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農業社會教育制度而興，故近代中國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爲斷。

建立此種基準的主要理由，即在同治元年以前，中國雖然也曾與西洋各國通商，但其時一般人以華夏自居，以夷狄處西洋人，故西洋文化不曾影響於中國，而中國的教育制度，完全爲中國數千年以農立國之農業社會的產物。鴉片戰後，國人鑒於外國之堅甲利兵，爲勢所迫，不能與西人交涉，更爲事所迫而不得不設

立學校培植交涉人材，於是有京師同文館之設。論組織及學科，該館俱不能稱爲合於西洋教育之新式學校，但光緒二十四年京師設大學堂以前之所謂洋務人材，幾完全取材於該館，該館實際爲新式高等教育之中樞；而二十八年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二十九年張之洞等改訂學堂章程，亦莫不以同文館之往事或前轍爲言而思有以革新之；則中國現行之教育制度固以同文館爲先河，故近代中國教育以該館之設立期爲斷。換言之：近代中國教育史之所謂近代，卽自清同治元年至今之六十年。

（二） 本問題之價值

我常以爲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有理性，文明民族之所以異於野蠻民族者在於能用歷史；野蠻民族亦有其社會活動，亦有其社會活動之歷史，但他們既不能利用文字將社會的遺產傳之後世；卽憑長者之傳說以爲生活之指導，但除了服從社會傳說以外，不能如文明人之利用先民的種種成績以爲研究改進生活之方法的基礎。所以我以爲要改進中國的教育，非注意於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不可；要改進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教育，尤非注意於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

不可。

從歷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見許多問題的因果：昔日所百思不得其解者，可一旦豁然貫通，昔日所視為神祕不可解釋者，可有至當不易的原因；則歷史的研究，不獨可以利用先民的成績以為改進生活之資，且亦一種最有興趣之事。然而六十年來中國教育制度由書院而學堂，由獎勵實官而畢業學位，由日本制而美國制，其間變遷多端；即出版物中亦以教育占重要地位，何以獨未見有有系統之中國教育史，更何以未見有系統之近代中國教育史，或者教育者忽略其價值之所在而不注意研究罷！

一切歷史的研究都有其價值，而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更有特殊的價值，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我們曾經說過，中國以前之教育制度與方法完全為農業社會之產物，近代的中國教育則全為工商業社會的產物。就中國的社會情形言，決不能將西洋工商業極發達的社會的教育制度移植過來；然而事實上，清光緒二十九年，間接將西洋的教育制度由日本輸入，民國元年直接輸入之，十一年則更完全移植

美國的教育制度。若僅從表面看來，教育制度之移植，並不受何種條件之限制，故此時彼，均不會發生何種困難。但切實將改制三十年來之教育效果研究一番，便知道此種無條件的移植辦法，實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這種現象爲其他各國教育中所無。故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使我們知道教育制度與社會組織的關係，更足以啓發我們尊重國本的思想。

二、在教育史上，教育制度之發展本有兩種形式：一爲自然的，即實際的教育制度先存在於社會之中，然後由國家採取最有效的一種方式而加以法律的規定，如英美之教育制度是；一爲人爲的，即先在紙上造成一種系統的圖案，然後使事實去遷就這紙上的方法，如日本及中國是。在原則上，此兩種方式自以第一種爲合理而效用大。但中國與日本均用第二種方式改革學制，何以日本以之強國而在中國則弊端百出？此問題若能詳細比較，不獨可以發見許多原因，且可爲比較教育的資料，其價值固不僅以中國教育史爲限也。

三、中國以閉關自守之故，素以尊貴之華夏自居，而以蠻夷視其他各國；在社會組織上，中國亦決不能冒然採用西洋之教育制度；然而戊戌政變後，一切新政

推翻，獨京師大學堂能繼續維持；庚子而後，並全部採用日本的教育制度，雖然說是當時達官如張之洞之流勇於革新，但其背景則完全爲外侮所逼成。由此可知國際強權之勢力之大，與國際潮流之不易抵抗，故近代中國教育史之研究，並有助於國際政治之研究。

四、自同治而後，中國舊教育制度，即因外力之壓迫而逐漸崩壞，光緒二十八年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後，舊者於數年之內，即便推翻。在法制上，書院制與私塾制不能存在，然而實際上，則私塾遍國中，據安徽廣東兩省之統計，私塾數遠過小學數，私塾生遠過小學生，由此可見人民對於私塾制之信仰猶未衰。從另一方面看，則自宣統年間提倡普及義務教育以來，至今除山西外，其他各省之進行甚緩；甚至義務教育之附稅被代表人民之省議會反對（江蘇浙江湖南），適足證明民衆對於學校教育之不信任。此種民衆信仰問題，在表面上似乎是一個知識問題，而實際上則有文化的條件在背後支配一切。所以西人經營數十年之教會教育，其根基可以隨收回教育權之聲浪而剷除；國家經營數十年之學校教育，其勢力不及同善社、悟善社之迷信宣傳。此種中西文化雜揉的變態現象，在近代中國各

種問題中均有表現，然而無如在教育中所表現者之顯著而普遍；則近代中國教育史之研究，最少亦能供給近代文化史以許多可寶貴之資料。

五、自光緒二十八年改制而後，新教育之根基實未穩固：一般民衆固然迷戀於私塾制度，即社會上號稱優秀的知識分子亦對於此種制度懷疑；不獨懷疑教育宗旨上之軍國民主義、資本主義等等，即對其辦法亦表示不滿，現時梁啟超、梁漱溟常乃惠等其代表也。由此種思潮所演成之具體方案雖各不同，但最少有兩種共同的傾向：（一）在消極方面反對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教育制度；（二）在積極方面提倡書院制之講學精神。自五四而後，中國固有的教育精神幾完全消滅，而西洋之新精神又未曾學得，加以政治社會上的種種誘因，遂致學校無大小，幾於無校無風潮，而報紙上之新聞亦幾於無日無風潮的紀事，於是教育者以至於一般民衆均感覺教育的改造爲目前當務之急。然而決非見日本倣德制強而效日本，見美國地大物博重地方分權而仿美制所能爲力，最少亦當於已往數十年之教育史蹟中，求出現在教育現象所以如此之故，而注意於本國歷史上之教育特點，及現在教育思潮之傾向，再參合世界教育潮流，以爲改進的張本；則近

代中國教育史之研究，不獨在明既往，且可以使未來之進行方針有所依據，不至忘本亂傲，其有益於教育政策者蓋非淺鮮。

總之，近六十年之中國教育史，完全爲中西文化雜揉過渡期之教育紀載，雖然全部改行西洋教育制度的時間不及三十年，但因其構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爲外侮的壓迫而非自動的採擇，故無論何時，均有中西文化兩大思潮互相激盪，互相排斥。在中國社會組織與民族習慣兩方面均不宜於採用現行的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制度，但爲着外力的逼迫，勢不能不走此路。故在表面上極力模倣，想收速效，而實際上則仍爲固有之思想與習慣所支配，遂至橘逾淮而變爲枳，其效相反。因而三十年來之中國新教育，其複雜變化之度與夫衝突不安之狀，既非各國所有，更非中國舊時所有，其情形至爲特別。此問題之研究不獨爲研究中西文化溝通與中國教育改造的鑰匙，而且至饒趣味，教育者固當樂於從事而努力從事也。

（三）背景之研究

人類活動原爲整體的，爲敘述便利計，我們誠可將各種活動的現象，分爲若

干類研究之。但各種活動決非孤立的，與其他活動均有相互關係，故欲明某種活動之歷史，絕不可不研究其他與此活動有關係的事實以爲旁證，而使此種活動之因果益明確。教育爲社會事業之一種，亦爲政治問題之一種，其一切因革，均與政治及社會組織有至密切的關係，而近代中國教育史除中國政治與社會問題外，又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所以近代中國教育史之背景應特別注意者有下列三事。

一、外交

中國近六十年來之教育完全爲外力所逼成，我們若不注意近代中國外交上之各種變化，而反在教育現象中研究教育史，即能將六十年來之教育事實鉅細無遺詳爲記載之，亦不過一本流水簿耳，並不能示近代中國教育的盈虧如何。換言之：清季之外交失敗爲構成新教育之總因，無此總因則現在中國的教育決不會如此。所以研究近代中國教育史，不可不先注意於此。

清季一部外交史，除了國恥的事實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東西。而與近代教育最有關係者，計有：(1)鴉片戰爭，(2)太平天國之亂，(3)英法聯軍入北京，(4)中日戰爭，(5)拳民之亂五事。

鴉片戰爭以前，我國雖也曾與西人交通，但其範圍只以商務爲限，而且中國之弱點未曾暴露於外，西洋文化在中國不會發生何種重大的影響。鴉片戰爭而後，國人在思想上雖然要保持華夏蠻夷的舊觀念，但西人堅甲利兵的事實却不能不承認。於是昔日輕視蠻夷的觀念，逐漸爲畏懼強鄰的觀念所替代。而且江寧條約、中法條約均規定外國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居留之權，其居民並不受中國法律之裁判；他們自視甚高，既不同化於中國，便不能不設立學校以教育其子女。在實際上，西洋的教育制度既因條約而逐漸輸入，而國人思想之變化更受新制度之採用的重大影響；蓋如未經此次戰爭，中國即欲採用西洋教育制度，亦必不全盤承受，其結果亦決不至如現在也。

太平天國之亂，在正式的外交上雖沒有什麼重大問題，但清廷借用英法兵攻太平軍，更予民衆以外兵可畏之印象，而上海租界上喪失國權的種種事實，也均於那時植其根基。蓋當咸豐三年八月劉甯川攻陷上海之後，外人之僑居上海者，倡中立之議，關稅權於此時喪失，會審制度於此時起源，外人在中國領土內之行政制度亦於此時建立。今日上海爲全國出版業之中心，隱然操縱全國文化而